

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陈红霞, 李国平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选取 1985~2007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对 23 年间北京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演变规律进行分析, 并在对纵向数据分析基础上, 综合运用基尼系数反映的收入差距相对水平, 和城乡居民收入比较差距反映的比较水平两个指标, 对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发展状态和趋势进行科学判断。研究认为, 北京市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大致经历“低收入公平型”→“低收入不公平型”→“高收入不公平型”的演进过程。进一步的计量模型分析结果揭示, 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 城市化水平和二元结构系数三个变量对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的影响是正向的, 而政府财政支农比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负向的, 进而探讨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关键词: 北京; 收入差距; 基尼系数

中图分类号: F11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09)06-0794-08

北京市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也代表着中国大都市的未来发展方向。考察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不仅对北京自身, 也对其他城市的城乡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就北京市目前的收入差距这一指标看, 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似乎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进步相伴而生。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1985~2007 年的, 北京市 2007 年的 GDP 是 1985 年的 36.4 倍, 平均年增长速度达到了 18.1%; 按常住人口统计^①, 2007 年的城市化水平达到 76.6%, 相比 1985 年, 提高了近 17 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 北京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2007 年, 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相差 12 430 元, 23 年间, 这一差额的年增长率为 19.3%。可见, 如何正确认识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涉及到城乡收入差距的国外相关研究文献, 多是从城市化、经济发展等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视角展开的。在著名的“倒 U 假说”中, 库兹涅茨提出, 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迅速扩

大, 之后是短暂稳定, 在增长的后期这一不平等趋于逐渐缩小。这一论点引发了大量学者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讨论, 贝克尔 (Becker C M) 的研究证明, “库兹涅茨曲线”体现的关系不仅在国家层面上成立, 对城市部门也是成立的^[1]。也有研究从人口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展开, 例如, 有学者认为人口增长与人口中最富裕的 5% 所占有的收入份额呈现正相关关系^[2], 也有学者利用国家间的数据研究, 证明人口增长率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关系^[3]。同时, 一部分文献将分析的侧重点集中在经济模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方面, 如探讨贸易模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4], 二元结构对收入差距的作用等^[5]。

国内相关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种途径, 其一是采用各种指标和方法测量收入在不同时间段、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差异性, 从而描绘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如向清成利用标准差和变差系数等方法测度了建国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地域分布, 认为中国的地域差异显著, 其中省际差异呈 U 字型变化, 东西差异由小变大, 南北差异不断缩小, 而城乡差异波动性大^[6]。刘剑锋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收稿日期: 2009-03-16 修订日期: 2009-08-1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067104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07BJ07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陈红霞 (1980-), 女, 黑龙江人。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学。E-mail: chen hongxia@163.com

* 通讯作者: 李国平, 博士生导师。E-mail: lgp@pku.edu.cn

① 考虑到北京外来流动人口较多, 因此, 这里的城市化水平采用城镇人口与常住人口数之比, 而非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计算。

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指标,衡量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得出中国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在1978年以后逐年缩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拉大,2003~2006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步伐明显放缓等结论^[7]。张可云和徐静从区域经济实力、居民生活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三个方面着眼,测度了北京市南北城区发展差距,其中,为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选取的绝对指标是职工平均工资,相对指标是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8]。郭馨梅和李佳以2000~2006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率为主要指标展开研究,结论认为,在北京市的加速转型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呈现加速度的整体性跃迁,收入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产生了不均等的分配^[9]。宋臻认为“倒U理论”与“市场转型理论”均试图用经济发展或市场化水平的单一因素来解释收入差距变化,存在诸多局限,进一步地,应用问卷调查的形式,研究了北京、无锡和珠海三地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10]。此外,有学者于从城市社会地理学的角度,研究社会区域收入格局的空间分异^[11]。顾朝林等学者认为在北京的农村流动人口和工作在独资或合资企业的高薪雇员,正在产生两个新的社会集团,其中一个低收入组,另一个是高收入组,进而形成了北京的城市社会极化现象^[12]。其二是采用定量分析模型考察某地区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以及其他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如有学者认为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解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的最重要因素^[13]。姚翠友的研究认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包括城市化水平、就业结构、政府财政支农的比率等几个方面^[14]。郭馨梅和邱战槐的研究成果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阶层的加速分化和个人经历以及家庭背景等方面都是造成加速转型期北京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15]。

通过对现实的分析和文献的梳理可知,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过程可能较为复杂,只有考察尽量长时间段内的居民收入差距,并采用计量模型客观分析各变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过程和相对重要性,才能对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有较为全面和系统地把握。为此,本文将研究内容分为三个层次,即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过程,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描述,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采用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比两个指标计算

居民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通过二维图像描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路径,并对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分析。然后采用计量模型,突出城市化、政府财政支农比例、就业结构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确定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和相对重要性,并提出未来发展的优化方向。

1 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过程与现状

1.1 数据

就数据的时间维度看,本文选择1985~2007年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数据,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跨度,原因有三点:其一,本文的数据皆来自于《北京市统计年鉴》,尽管对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有更早些的统计,但由于本研究涉及了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如对城市化、政府财政支农比例、就业结构变化等数据的分析,因此,考虑到数据的一致性和连续性,选择起始点为1985年;其二,只有考察尽量长时间段内的居民收入差距,才能对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变进程有较为全面和系统地把握,因此,本文所使用数据的时间跨度较大,为23年;其三,1986年开始实施中国第七个五年计划,选取2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便于进行收入差距演变的过程分析和阶段判断。

就数据的结构维度看,本部分内容分析拟采用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比两类数据。其中,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的通用分析指标,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因此,基尼系数反映了特定区域居民收入差距内部的层次性,应用这一指标可以更科学地刻画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从而比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居民的贫富差距。本文研究所处理的数据涉及到67 518个样本,城镇家庭占总样本本数的41.6%,农村家庭占58.4%。城乡居民收入比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计算,这一指标反映了特定区域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值比较,应用城乡居民收入比可以更直观地描述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发展的绝对差距状态。

1.2 演变过程分析与现状判断

通过整理1985~2007年北京市城乡收入数据可知,23年间,北京市城镇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

与乡村居民的年均纯收入差额呈现逐渐扩大趋势。其中,以 1992年为分界点,在此之前,这一差距的年增长幅度较小,在此之后,差距趋于快速扩大。此外,2002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正以年均逾千元的速度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如图 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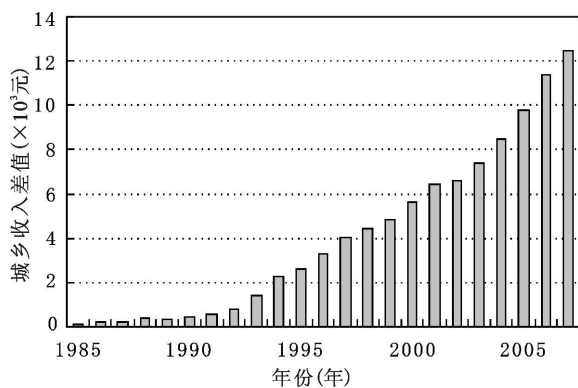


图 1 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数额值变化

Fig 1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Beijing

为消除居民收入量纲(单位)的影响和变量自身变异的影响,对本文所涉及的人均收入采用标准差标准化方法进行处理,即将某变量中的观察值减去该变量的平均数,然后除以该变量的标准差,记做,有:

$$I(t) = (I'(t) - \bar{I}(t)) / S(t) \quad (1)$$

其中, $\bar{I}(t)$ 为观测期年人均收入,其数值采用城镇人口年均可支配收入乘城镇人口比重与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年均纯收入乘农村人口比重之和计算, $S(t)$ 为居民收入标准差, t 为观察数据的年份,有 $t \in \{1985, 1986, \dots, 2007\}$ 。

经过标准差标准化后,所涉及的收入数据都变为没有单位的纯数量,同时,经过这一处理过程,各变量将有约一半观察值的数值小于 0,另一半观察值的数值大于 0,变量的平均数为 0,标准差为 1。

进一步地,将各年度的 $I(t)$ 作为纵轴,以同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作为横轴,所形成的二维变量散点图如图 2所示。

如图 2所示,横轴代表观测年度居民人均收入与时间序列年度人均收入无差距,纵向的虚线垂直于点 $[0.3, 0]$,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对基尼系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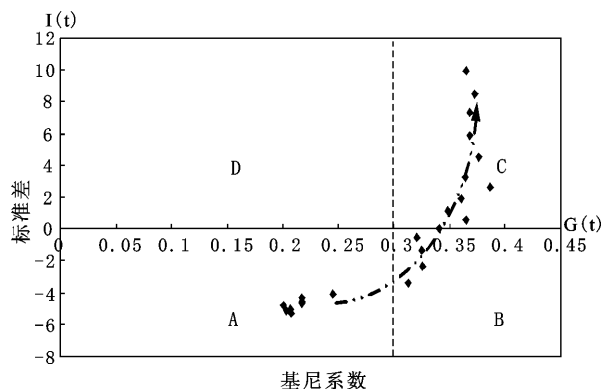


图 2 北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变散点图

Fig 2 Scatter of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Beijing

规定^①,落在该点左侧区域的散点意味着对应的居民收入比较平均,落在该点左侧区域的散点意味着对应的居民收入相对不平均。进一步地,根据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与人均收入的数据特征,可以使用横轴和纵向虚线将北京居民收入差距演变散点图划分为 A、B、C、D 四个象限区域,沿用陈昌兵研究中的定义^[16],分别称之为“低收入公平型”、“低收入不公平型”、“高收入不公平型”和“高收入公平型”。

A 象限属于“低收入公平型”,落在该区域的散点意味着相应年份的城乡居民收入低于北京市历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同时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好于总的公平程度。B 象限属于“低收入不公平型”,落在该区域的散点意味着相应年份的城乡居民收入低于北京市历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同时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差于总的公平程度。C 象限属于“高收入不公平型”,落在该区域的散点意味着相应年份的城乡居民收入高于北京市历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同时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差于总的公平程度。D 象限属于“高收入公平型”,落在该区域的散点意味着相应年份的城乡居民收入高于北京市历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同时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好于总的公平程度,这一区域是最理想的收入水平与分配状态。

图 2显示,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散点呈现较为连续的集中分布、“半 U 型”的发展态势。总体上看,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低收入公平

①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 0.2 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 表示比较平均;0.3~0.4 表示相对合理;0.4~0.5 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 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 0.4 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型”→“低收入不公平型”→“高收入不公平型”的演进过程,即随着时间推移,一方面城乡平均收入增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另一方面,不论是从收入差距的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角度衡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如图 2 中虚线箭头所示,近几年,收入差距散点有向纵轴偏移的趋势,即北京市居民城乡收入差距有从“高收入不公平型”向“高收入公平型”转变的倾向,但偏移幅度不大,这也说明目前北京市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依然比较严重。

2 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

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比这一指标反映了特定区域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值,相对于基尼系数,可以更直观地描述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发展影响因素的绝对差距状态,因此,本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定量研究简化为对城乡居民收入比影响因素的研究。尽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但由于区域的异质性,一般性的基础理论很难对特定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原因和各因素的作用程度给予解释,不过,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已经普遍被认为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2 1 变量定义与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以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研究对象,采用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考察的时间区间是 1985~ 2007 年,以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 (IGBUR) 为因变量,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外部环境等角度分析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产生原因。

基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选取四类变量分析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第一类变量是就业结构变量 (SOEV),以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 (POSTIE) 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年增长率 (GROEITI) 两个指标进行测度;第二类变量是社会结构变量 (SSV),选取城市化水平 (UL) 为指标测度;第三类变量为经济结构变量 (ESV),选取人均 GDP 增长率 (GROPCG)、二元结构系数 (DSC)^① 和非农产业产值年增长率与农业产业产值年增长率之比 (RONAA) 为指标测度。第四类变量为环境变量 (EV),从定量分析角度出发,将政策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采用政府支农比例 (POGSFA) 和基于农业的商品生产环境 (CEOA) 两个指标测度。

变量的内涵及基本计算方法如表 1 所示:

表 1 计量模型主要变量及计算

Table 1 Main variables and their meaning in the econometric model

变量	内涵与计算
IGBUR	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
SOEV	1、POSTIE 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
	2、GROEITI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年增长率
SSV	3、UL 城市化水平,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
ESV	4、GROPCG 人均 GDP 增长率,GDP 增长率与常住人口之比
	5、DSC 二元结构系数,用城乡比较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即城镇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农村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之比
	6、RONAA 非农产业产值年增长率与农业产业产值年增长率之比
EV	7、CEOA 基于农业的商品生产环境,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之比,其中,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商品零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是一定时期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
	8、POGSFA 政府财政支农比率,为财政中农业支出与地方总的财政支出之比

2 2 模型结果分析及对区域收入差距形成与发展的解释

通过对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本文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定量分析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先初步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通过检验相关参数显著性、多重共线性等指标判断进一步分析所应采用的方法。在初步构建的模型中,因

变量 IGBUR 是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得到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模型刻画了四大类变量对 IGBUR 的回归结果,反映了各变量对北京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值水平的影响。

模型 I 以 Y 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他八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做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则 Model I 形式如 (2) 所示:

① 在国际上一般采用二元结构系数为指标测度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

假设 t 年的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是一系列因素的函数, 则:

$$Y(IGBUR_t) = \alpha + \beta_1(POSTIE_t, GROEII_t) + \gamma_1(UL_t) + \lambda_1(GROPCG_t, DSC_t, RONAA_t) + \delta_1(POGSFA_t, CEOA_t) + \varepsilon \quad (2)$$

其中, $t \in \{1985, 1986, \dots, 2007\}$, α 为常数项, β 、 γ 、 λ 和 δ 分别为就业结构变量、社会结构变量、经济结构变量和环境变量的参数。

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计量模型变量及主要参数
Table 3 Main variables parameters in the econometric model

	模型 I				模型 II			
	Coeff	t	Sig.	VIF	Coeff	t	Sig.	VIF
Constant	- 11.633	- 6.771	0.000		- 11.110	- 6.864	0.000	
1 POSTIE	10.202	4.025	0.001	5.629	11.016	7.055	0.000	2.261
2 GROEII	- 1.341	- 1.247	0.233	1.107				
3 UL	7.454	2.511	0.025	3.623	5.522	2.566	0.019	2.015
4 GROPCG	0.509	1.019	0.326	1.893				
5 DSC	0.120	1.848	0.086	7.030	0.084	1.917	0.071	3.402
6 RONAA	0.002	0.912	0.377	1.315				
7 CEOA	- 4.608	- 1.388	0.187	1.594				
8 PGSFA	- 0.072	- 0.113	0.912	1.878	- 5.620	- 2.013	0.059	1.193
R		0.951				0.940		
R ²		0.905				0.884		
$\bar{R}^2$		0.850				0.858		
F		16.592				34.322		

模型 I, 从统计学角度看, 在这一多元线性回归结果中, R^2 值接近于 1, 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较高, 但为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计算 VIF 值, 发现变量 5 和变量 1 的 VIF 值超过 5, 其中, 变量 5 的 VIF 值最大, 为 7.03, 说明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多重共线性。鉴于以上的分析, 本文采用向后剔除法, 即先将八个解释变量代入模型中, 在运算中设定 F 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以此为标准删除那些不显著的变量, 直至没有自变量不显著进行运算, 得出最优的结果。

模型 II, 经模型运算, 应用向后剔除法, 共剔除四次, 先后删除的解释变量分别是 7、6、4 和 2, 最终模型保留的解释变量是 1、3、5 和 8。通过对各解释变量之间的显著性检验发现, 虽然 5 的显著水平略高于 0.05, 但整体显著水平较好, 各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 5.000, 最后确定这一模型为最优模型。Model II 的分析结果如上表 3 所示, 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与各解释变量之间的多元线性关系为:

$$IGBUR_t = - 11.110 + 11.016POSTIE_t + 5.522UL_t + 0.084DSC_t - 5.620POGSFA_t \quad (3)$$

从各解释变量的作用方向可以看出, 第二、三

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 城市化水平和二元结构系数三个变量对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的影响是正向的, 而政府财政支农比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负向的。

首先, 就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这一解释变量看, 相对于农业从业人员, 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越多, 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这是因为就业是收入的来源, 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活动, 而城镇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第二、三产业, 在目前的生产条件下, 第二、三产业的产业效益远高于第一产业, 显然, 这是城市化的动因之一, 也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的重要原因。

其次, 就城市化水平这一解释变量看, 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会加大北京市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这一结论有别于部分学者对其他地区的实证研究, 如张士云等人对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结果^[17]。城市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反向作用来源于区域的特殊性, 北京市是一个人口总量超过一千万的大城市, 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是外来人口的快速增长, 以及向城市中心的快速集聚, 不同于其他部分地区的本地城市化模式, 北京市郊区农民的城市化并不显著, 因此, 城市化水平

① VIF 值为方差膨胀因子, 是对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的方法之一。当 VIF = 1 时, 无多重共线性; VIF 值越大, 所观测的解释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的线性相关性越高, 多重共线性越严重。

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本地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自然对收入差距没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再次,就反应城乡二元结构的城乡比较劳动生产率这一解释变量看,城镇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农村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之比越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这是因为比较劳动生产率反映了 1% 的劳动力在该部门创造的产值(或收入)比重,城乡比较劳动生产率越大,证明 1% 的劳动力在非农业部门创造的产值(或收入)比重大于 1% 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创造的产值(或收入)比重,非农业劳动生产率效率高于农业产业生产效率,城乡收入自然扩大。

最后,就政府支农比例这一解释变量看,财政中农业支出占地方总的财政支出比例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财政支出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政府财政支农中,一部分用于支援农村生产,即国家财政对农村集体(户)各

项生产的支援支出;另一部分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用。政府财政支农能够更好的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实现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从各解释变量的作用程度可以看出,在其他变量保持一定的条件下,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11.016 个单位;城市化水平每提升一个单位,将引起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5.522 个单位;城乡比较劳动生产率每提高一个单位,将引起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0.084 个单位;政府支农比例每提高一个单位,将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5.620 个单位。可见,就业结构对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政府支农比例和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城乡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

模型 II 中,主要解释变量与 IGBUR 之间关系的点图如下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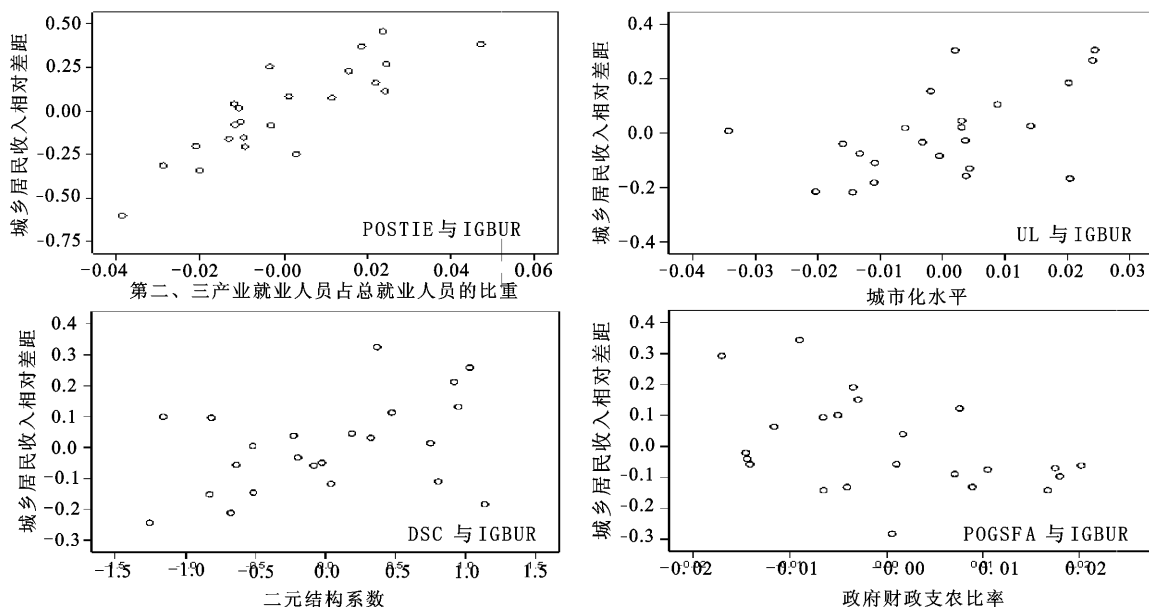


图 3 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与各解释变量关系点图

Fig 3 Partial regression plot of main variables

3 关于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讨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以服务型与知识型经济为代表的区域经济显示出了强大的活力,各区县都逐步建立起了各具特色的产业体系^[18],但另一方面,1985~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率约为 15.9%,而农村居民的

年均纯收入平均增长率仅为 12.3%,这一事实证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仍是不争的事实。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原因很多,就本文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看,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从多个角度开展工作。根据本研究的计量分析结果,有下面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3.1 生产效率提高与产业发展方面

根据本文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农业和农村中非

农产业的发展均会促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两类经济形式的发展在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变化途径上不同,农业生产率效率提高意味着每单位农业劳动力的创造的经济效益增加,这会在非农产业生产效率不变的情况下,降低城乡比较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即使考虑非农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但只要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速度比较,能够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城乡收入差距水平依然会降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可以采取多种方法,结合北京的实际情况,农业机械化生产具有可行性,但也可以结合北京市功能区划的发展趋势,发挥农村非农经济作用,充分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此外,根据计量模型分析,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的提升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针对个案的特点分析,产生这一结果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其一,如前所述,在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差距的前提下,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的提升必然扩大收入差距;其二,与区域的城市化特点有关,北京城市化人口增长更多来源于外来人口,且多从事二、三产,本地第一产业农民的就地实现非农转移的较少;其三,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有关,按照库兹涅茨曲线分析,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因此,计量结果并不意味着否定城市化,而恰恰说明应该在现在和今后的工作中,重点推进农业生产率提高,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前提下,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3.2 城市化与乡城合理转移方面

在二元结构经济向发达的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或者说劳动力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是一个必然发生的共生现象^[19]。按照经典的城市化理论,促使农民向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岗位转移,增加其工资性收入是缩小收入差距最根本的方法。根据本为计量模型的结论,快速的城市化过程成为影响居民收入的“双刃剑”,一方面,要素流动是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巨大动力^[20],城市化加快了城市中心的发展,促进了第二、三产业的调整升级,提高了GDP的水平,提升了人均收入;另一方面,由于产业效益和就业结构的差异,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城镇居民收入大于还未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收入,从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具体结合北京市的实际情况,在未来的发展中,一方面,应扩大城镇就业岗位,增加城市吸收本地城市化市民的

可能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城市化的社会服务体系,如对本地农村居民“城市化”过程中的就业等予以专业的培训与指导,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城合理转移。

3.3 政府支农比例与支农效率方面

根据计量结果,政府财政支农比例的上升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增加政府支农的财政支出意味着或是增加财政收入,或是缩小其他财政支出部分,即调整支出结构。为实现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北京市各级政府已向农村和农业生产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稳定发展。根据北京市目前的财政收入状况,在未来的工作中,调整支出结构更具可行性。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政府可以进一步借助市场的力量,节约部分财政支出,用于支援农业生产。此外,在支农过程中,应在资金的使用数量和分配结构上提高支农效率,可以结合北京市总体规划、区县的职能分工等统筹考虑,如加大对北京市周边生态涵养区农村居民的相关费用支出等。

4 结 论

通过考察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及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揭示,1985~2007的23年间,北京市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正经历着“低收入公平型”→“低收入不公平型”→“高收入不公平型”的演进过程。进一步的计量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城市化水平和二元结构系数三个变量对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的影响是正向的,而政府财政支农比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负向的。针对北京市目前的城市功能分区,城市化进程等现状,本文对缩小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深入讨论,可以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非农产业发展;扩大城镇就业岗位,推动乡城合理转移;增加政府支农比例,提高政府支农效率等方面着手进行。本文研究对处于城市群中心地位的核心城市的城市化,以及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等都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Becker C M. Urban Se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87, 21: 127-145.
- [2] Ahluwalia M S. Inequality,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76 (3): 307-342.
- [3] McNollig. Consequences of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Over

- view and Assessment[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4, (10): 177-240
- [4] LA Winters, N McCulloch, A McKay.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poverty: the evidence so far[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 XLII: 72-115.
- [5] F Bourguignon, C Morrisson. In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dualism[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8, 57: 233-257.
- [6] 向清成. 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地域差异[J]. 地理科学, 2002, 22(3): 276-281
- [7] 刘剑锋.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及对策分析[J]. 经济研究参考, 2009(45): 21-24.
- [8] 张可云, 徐静. 北京城区发展差距问题研究[J]. 北京社会科学, 2003(3): 40-47
- [9] 郭馨梅, 李佳. 加速转型期北京居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22(2): 81-87
- [10] 宋臻.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研究——基于北京、无锡、珠海三地的问卷调查及分析[J]. 学海, 2003(2): 115-121.
- [11] 程丽辉, 王兴中. 西安市社会收入空间的研究[J]. 地理科学, 2004, 24(1): 115-121
- [12] 顾朝林, C·克斯特洛德. 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J]. 地理学报, 1997, 52(5): 3-11
- [13] 周端明, 刘军明. 二元性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 理论模型与计量检验[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37(3): 264-268.
- [14] 姚翠友. 北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市场, 2008, (5): 111-113.
- [15] 郭馨梅, 邱战槐. 加速转型期北京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探析[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1(4): 100-104, 99
- [16] 陈昌兵. 各地区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计算及其非参数计量模型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7(1): 133-142
- [17] 张士云, 吴连翠. 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07(2): 72-78
- [18] 李国平, 薛领. 产业与空间: 北京市产业用地分析、评价与集约利用研究[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79-89
- [19] 陈宗胜. 发展经济学——从贫困走向富裕[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257
- [20] 陈秀山, 张可云. 区域经济理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306.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and Major Effect Factor of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 Beijing

CHEN Hong-xia LI Guo-ping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object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 Beijing. Selecting the time-series data of 1985-2007,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 Beijing. Based on the longitudinal data analysis, using two indicators, which are the Gini coefficient reflecting the relative level of income disparity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paper gets some scientific judgments which reflect the state and trends of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 Beijing. In the 23 year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average annual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in Beijing and an average annual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expands gradually. Studies suggest that changes of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 Beijing experience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which is "low-income-fair-type" → "low-income-unfair type" → "high-income-unfair type". Further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econometrics model, which contains eight indicators of four categories of variables, revealing that there are many elements cause the results of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 Beijing. In these elements, three variables impact positively on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 Beijing, which are the employment proportion in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o total employment,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dual structure coefficient, and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impacts negatively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Based on the study above, the paper gets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proposals. It is significant to study the evolution and major effect factor of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 Beijing, not only for Beijing itself, but also for the other cities.

Key words Beijing income inequality Gini Coefficient